

布衣文丛

随遇而安

主 编 邓九平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随 遇 而 安

邓九平 主 编

于海婴 ~~副主编~~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31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随遇而安/邓九平主编. —北京: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
1997. 2

(布衣文丛;4)

ISBN 7-80112-092-2

I. 随…

II. 邓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5402 号

责任编辑 罗 青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2 号 邮编:100006)

河北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.25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10 千字 印数:0001-5,000

定价:13.00 元

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，又是一个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，毕生的责任和追求，就是努力把『人』这个字写得端正些。

贾植芳

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，才能不去抢行情，
争座位；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点
生活，不要花招，不欺骗读者。

汪曾祺

《布衣文丛》顾问

钟敬文	教授
张岱年	教授
严文井	先生
冯亦代	先生
卞之琳	先生

《布衣文丛》编委会

牛 汉	碧 野	汪曾祺	邵燕祥
林斤澜	舒 乙	邓九平	任洪渊
周传云	于海婴	斯 好	张树英

平心静气

——《布衣文丛》代序

汪曾祺

把这样一些看似彼此没有多大关联的文章放在一起，编成一套书，有什么意义？意义还是有的。这些文章虽然散散漫漫，但有一种内在联系贯通的东西，那就是都是谈人生的，对人生的态度和感受。或多或少，都有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。

宋儒提出过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这种不通人情，悖乎人性的酷论，因此为后世所诟病，但宋儒亦有可取的一面。我很欣赏这样的境界：

万物静观皆自得，

四时佳兴与人同。

用一种超功利的眼睛看世界，则凡事皆悠然，而看此世界的人也就得到一种愉快，物我同春，了无粘滞，其精要处乃在一“静”字。道家重“习静”，“山中习静朝观槿”，能静，则虽只活一早上的槿花，亦有无穷生意矣。“与人同”，尤其说得好，善与人乐，匪止独乐，只真得佳兴。

宋人又有诗：

顿觉眼前生意满，

须知世上苦人多。

这说得更为明白。“生意满”即“四时佳兴”，“苦人多”说出对众生的悲悯关怀，此蔼然能仁者之心也。

这样的对生活的态度是多情的，美的。

人之一生感情最深的，莫过于家乡、父母和童年。离开家乡很远了，但家乡的蟋蟀之声尚犹在耳。“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”，不论走到天涯海角，故乡总是忘不了的。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，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思想，西方人是不大重视的，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。“瓶花妥帖炉香稳，觅我童心四十年”，“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，人到上了岁数了，最可贵的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、碧绿的童心。此书所收的文章，写家乡、父母、童年的比较多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
人生多苦难。中国人、中国的知识分子生经忧患，接连不断的运动，真是把人“整惨了”。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能把一切都忍受下来，在说起挨整的经过时并不是椎胸顿足，涕泗横流，倒常用一种调侃诙谐的态度对待之，说得挺“逗”，好像这是什么有趣的事。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。唯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。唯有幽默，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。平心静气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，也是优点。

现在处在市场经济时期，像一般资本主义初期积累时期一样，不免会物欲横流，心情浮躁，重利轻义，道德伦理会遭到一场大破坏。在这样的時候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委托邓九平同志主编这套《布衣文丛》，有何意义，对青年读者会产生什么影响？影响是有的，唤醒青年的良知，使他们用一种更纯真，更美的态度对待生活。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在青年人干涸的心里洒一片春雨。

是为序。

1996年11月

目 录

1	王西彦	高大的拱桥
9		趋势的心和为了还债的书
25	杜 宣	狱中生态
29	梅 志	悼念之余——忆聂老绀弩
39	钟理和	贫贱夫妻
51	于光远	自勉集
69	严文井	给匆忙走路的人
72		一个低音变奏
77	贾植芳	沉闷期的断想
91	徐中玉	谈寂寞
96		忧患深深八十年
107	秦兆阳	写在房梁上的诗——往事散记
113	碧 野	大海风涛
118	刘北汜	生命

120	吴祖光	童年二题
125		二十年书怀
130	琦 君	泪珠与珍珠
133	陈 原	在医院里
135	周汝昌	我的笔
139	单 复	生命
142	黄秋耘	行吟阁遐想
145		雾失楼台
155	魏荒弩	默默者存——沈从文先生和我
166	秦 牧	人格的力量
175	冯 牧	久病延年
181	吴冠中	三方净土转轮来：黑、白、灰
183	何满子	如果我是我
192	王元化	《思辨发微》序

197	朱 寨	俞平老的“书生气”
202	汪曾祺	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自己
212		随遇而安
221	郑 敏	闷葫芦之旅
228	柯 蓝	随笔七则
233	唐 湜	火星
236	彭燕郊	浪子
240	魏 巍	我的老师
246	黄宗江	七十还乡
252	丁 耶	妻颂
258	艾 煊	空空实实之居
265	何 为	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
276		最后一圈
278	舒 芜	炎风小语

281	牛 汉	回顾和思考
296	林斤澜	山口
302		榕

王西彦 (1914—)

浙江义乌人。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文学评论家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夜宿集》、《人性杀戮》，长篇小说《在漫长的路上》，散文集《王西彦散文选》，文艺评论集《评阿Q和他的悲剧》等。

高大的拱桥

得到茅盾同志长辞人世的消息后，我很有些心绪不宁，总感到惘然如有所失。不久以前，我接到他寄的两册新版《茅盾短篇小说集》，看到扉页上他那熟悉的秀劲的题字，虽然知道他近年来体衰多病，也料想不到竟然这样快就和我们永别。经历了十年劫难、备受蹂躏的我们文艺界，有多少前辈和同伴含冤弃世呵！1979年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，当宣读那个长长的牺牲者的名单时，我满眼含泪地望着茅盾同志的身影，向自己告慰道：“沈老呵！愿您健康些，更健康些！愿您长命百岁，永远和我们一起！”我这个祝愿，并不是完全出于私心。1936年鲁迅逝世时，我还是个青年学生，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，开始学习写作不久，一直把鲁迅和茅盾当作自己的旗帜。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，当时的革命文艺界是“鲁、茅”并称的，

他们是并肩作战的亲密伙伴。鲁迅和我们永别了，茅盾却和我们在一起。这就是一种鼓舞，一种激励，一种慰藉。从1936年到1979年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曾经经历过怎样的风雨，怎样的战斗、摧残和锻炼呵！可是，你看，我们的茅盾同志仍然和我们在一起！长期的战斗生涯在他头上增添了白发，在他脸上增添了皱纹；而在同时，在他身上也增添了坚定，增添了战斗的热情；尤其是，在我们这支队伍里，更增添了对他的热爱，增添了对他的崇敬和感激……

我们感到了更大的鼓舞、激励和慰藉。

但我也愿意在这里说一件自己的事情，一个永存的记忆。

前面不是提到三十年代的旧事吗？当时我住在故都北平，一面在一所私立大学里上学，一面在一间会馆的小屋子里学习写作。不过，红柱彩瓦的大学教室（原是旧王府）和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对我的吸引力，远不如会馆那间纸窗泥墙的斗室和铺在小桌上的蓝格稿纸。我把自己的命运和兴趣，全部押注在写作学习上。最初，我向平津两地的几家报纸投稿；参加“左联”的活动以后，就改向上海一些属于“左联”或和“左联”有关的文艺刊物投稿。我所凭藉的，除了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傻劲儿，只是少年时期在浙江家乡农村的有限的见闻，以及从课外读物上获得的有限的文学知识。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来自师友们的关心和鼓励。但所有这一切，并不足以改变我那种独自摸索的窘境，情形很有些像一个困处暗室的孩子，满怀惶惑，渴望摸索到一道通向光亮的门户。到了1936年鲁迅逝世前夕，我在上海的刊物上，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，记得是《文学》上的《爱的教育》，《文学界》上的《曙》，《光明》上的《蛊惑》和《作家》上的《毒虫草》。自然不是同一个月发表的，只是在同一时期里。因为自觉是蹒跚学步时不稳定的印迹，在

青年人的兴奋里，也兼有初学写作者的疑惧——不知道将从读者和评论界得到怎样的反应。

当时，我知道在年青的同伴中间，有人曾经给鲁迅写信，甚至给他寄去习作。我也怦然心动，很想试一试。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，是大家都知道的给鲁迅转信的地点。我想，如果自己的习作能得到鲁迅的指点，该是莫大的幸运。可是，想归想，却没有当真那么做。并不是缺乏勇气，而是顾虑到他工作太忙，身体又不好。“你也写信，我也写信，全中国该有多少人想得到他老人家的指点呵，你教人家怎么应付得过来呢？”这样一想，我就强自按下颇为强烈的冲动，打消了原来的愿望。但自然，惆怅之情总是难免的，即使愿望本身似乎就属非分，还是觉得既经起了意，却又没有当真做，实在是一件可惋惜的事情。因此，踌躇复踌躇，老是拿不定主张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接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。

我原来住的会馆的房子，在和平门外西河沿一条阴暗的小胡同里。后来，有个同学约我在西单附近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合租了一所小房子，它有一个小院落和两棵并排耸立的榆树。几个住处相近的伙伴，经常聚集到我们的庭院里，或站或蹲在榆叶的阴影下面高谈阔论。大家年轻气盛，都正开始学习写作，尝试前途莫测的投稿生涯。在谈话时，除了对一些文艺问题发表一知半解的议论，还对同伴新近被登载在报刊上的习作展开尖锐的批评。如果意见不合，就会争吵得面红耳赤。就在一次高谈阔论之后，为了自己的习作受到批评，我正心怀委屈，闷闷不乐。随着围墙的小门被猛地叩响和骑自行车的邮递员一声悠长的叫喊：“有信——”，一封信也立刻从门缝里刷的一下蹦了进来。我急忙奔出自己的房间，把那封抛落在榆树根旁的信捡在手里。

“上海沈斌？”信果然是我的，是一个白洋信封，上面的字迹写得非常秀劲有致，“是谁写来的？我在上海哪里有姓沈的朋友呢？”

回到房间里，拆开信，先看了看信尾写信人的名字。霎时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沈雁冰！沈雁冰不就是大名鼎鼎的茅盾吗？是茅盾写来的！是他写来的！事隔多年，我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自己那种心跳手颤的慌乱景象，只记得还来不及仔细阅读信的内容，就急忙闯进住在对面那位同学的房间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：

“你看，茅盾来了信！茅盾来了信！”

“真的？”显然是一副不肯置信的口吻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！你看！你看！这不是！”

于是，把信平摊在那位同学的书桌上，两人头碰头地一起小声念将起来。写信人说，他读了我那四篇习作，从《文学》编辑部抄来通讯地址，要把他的意见告诉我。接着，就对那四个幼稚的短篇小说作了分析比较，指出作者应该发扬哪种写法，不应该采取哪种写法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所认为不应该采取的，是《爱的教育》里有些自己颇为得意的近于油滑取巧的地方。信并不太长，但言简意赅，既发人深思，又给人鼓舞。

“哦！真的是茅盾写来的！”读完信，那位同学好像还不敢置信似的，“他怎么会这样细心呢？真是！真有这样的事情！”

在人的一生中，青少年时代遭遇到的有些事情，尽管对局外人来说也许是无足轻重的，但对他却能产生影响终身的作用。最近，那位曾经和我共读那封茅盾同志来信的同学，从海外给我寄来一张经过复制的照片，就是1935、1936年间我们在北平合摄的，一起共九人，都是当时正开始学习写作的，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小院落的榆树下相聚高谈阔论的参加者。到了白发满

头的暮年，忽然见到这样一张年青时期的合照，的确令人产生无穷的慨叹。而尤其使我感到怅惘的，在这些伙伴中间，除了有一位已经在抗战初期因病逝世，大都早就放弃写作。看起来，我可能是在文学道路上的一个踽踽独行者。我自知才能过于平庸，在创作上很难获得较高的成就，却凭着一种执拗的意志，一种连自己也不易说清楚的责任感，不避风雨，忍受孤寂，勉力坚持了几十年，至今还没有放下手中这支缺乏光彩的笔。回想起来，三十年代茅盾同志那封热情的信，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。收到那信的当天晚上，我就给那位肯对陌生青年倾注这样深切关心的前辈写了一封长信。内容虽已淡忘，但记得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向关怀者同时也是向自己表示决心的誓言。当时，屠格涅夫的名著《罗亭》刚出版了新译本，对那位“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”的主人公，我们一面虽然怀有惋惜之情，一面却也引为自己的警戒。如果没有行动，言语就是欺骗。既然发了誓言，就应该用行动来实践，应该全力以赴，为自己的目标献出你整整的一生。如果畏惧艰险，半途而废，你怎么对得起曾经给你以关怀和帮助的人呢？自然，更主要的是，经过前辈指点，面前的道路变得更为明显，你的继续举步也就变得容易些了。

从那以后，虽然彼此很少见面的机会，通信的次数也不多，但只要有所求于他，总能得到他无私的帮助。我知道，在和我年龄相若的同伴中间，有人曾经得到他更多的提携和鼓励。当各自谈起从这位热心的前辈所得的帮助时，荡漾在我们心头的，不仅是单纯的感激，而是一种更复杂、更严肃的感情，一种振发精神的道德力量。现在茅盾同志离开我们了，我相信，那些曾经接受他的教益的人们，会从各自的角度表达出他们真挚的感受。就在写这篇短文时，我就读到了茹志鹃同志的《说迟了的话》，她用激动的语调，说起茅盾同志对她的教诲和鼓励，在她